

全元文

1

江蘇古籍出版社

李修生 主編

全元文

江蘇古籍出版社

1

全元文(一)

著 作 者 李修生 主编
责任编辑 卞 岐

出版发行 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025—3223462
社 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如东印刷厂
开 本 大 32
印 张 24.625
印 数 501—1500 册
字 数 530 千字
版 次 1998 年 9 月第 1 版第 2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7—80519—867—5/I·242
定 价 45.00 元

(江苏古籍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弁 言

白壽彝

一九八一年，北京師範大學成立了古籍研究所，這是在陳雲同志倡議研讀古籍之後，在全國高校成立的第一個研究所。經過了長時期的經營，古籍所先後出版兩部書。這是兩部大書。一部是《文史英華》，另一部是《全元文》。《文史英華》是供高校學生、中學教師和機關幹部誦讀的選本，它的編輯意圖是博而精。所謂博，是指上下兩三千年文史名著俱備。所謂精，是指所選作品，文、情、道、義必有所當，讀者可以提高閱讀水平。按照這個思想編的選本，發行所致，頗得佳譽。

《全元文》是比《文史英華》更大的一部書，在功力和見識方面，所需要

的供給不知要高多少倍。更加以元史素稱專門之學，對語言、地理、疆域、民族及其它有關的文獻知識所需甚廣，很不容易掌握。在研究人員、資料都很缺乏的情況下，古籍所把這部書的編輯重任承擔起來，不能不說是表現了一種很大的氣魄。目前，這部書已略有成就，看來可以相當順利地做下去了。我們在這裏預祝它的成功。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八日於北京

《全元文》編纂工作委員會

顧問（以姓氏筆劃爲序）

白壽彝

周林

郭預衡

啓功

劉迺和

鍾敬文

主編

李修生

副主編

龍德壽

曾貽芬

李夢生

吳小平

彭久安

編委（以姓氏筆劃爲序）

王明澤

卞岐

朱瑞平

李軍

李鳴

資料工作人員

李仲祥

楊玉芬

鄧瑞全

樊善國

魏崇武

龍德壽

羅超

徐勇

曾貽芬

張文澍

郭立傑

彭久安

邱瑞中

卓連營

周少川

姜小青

查洪德

李修生

李夢生

何本方

吳小平

邱居里

第一冊責任編委

李修生

曾貽芬

李鳴

前言

元，是中國古代蒙古族建立的王朝。一般史書以元世祖至元十三年（一二七六）滅宋，或以至元十六年統一全國，迄元順帝出亡，明朝建元（一三六八），稱元朝。韓儒林先生主編《元朝史》，則以成吉思汗建蒙古國，迄元順帝出亡（一二〇六一—一三六八），稱元朝。有的學者以元爲名，用以代表一個時代，指的是十三世紀至十四世紀的中國。元代是中國古代史的重要時期。元代政治、經濟、文化對明清兩朝，乃至近代社會，都有着明顯的影響。元代多元文化并存，國內文化發展步入新階段，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也更爲廣泛，與當時世界上幾個主要文明區域均發生聯繫。近代以來元史、元曲研究都可以稱爲顯學，并具有國際性；元代文化的諸方面，也有可以稱道的研究成績。但是，元代文化研究就整體而言，仍有很多薄弱點，有亟待加强的地方；依學科發展的趨勢和要求來看，還有不少待拓展的領域。若從研究的基礎工作方面來考慮，文獻資料的整理尚有許多事情要做。編纂《全元文》對全面開展元代文化研究便是一項不可或缺的工作。這項工作其實早已提上議事日程。陸峻嶺先生一九九三年六月十八日在《全元文》編纂工作座談會上說：「《全元文》編纂醞釀最早，陳垣老、翁獨

健先生在世時都曾有過此意。我們研究元史的人都希望此事早點成功。」楊志玖先生審定，李治安、王曉欣編著的《元史學概說》（天津教育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也曾說：「然至今《全文文》闕如。如果投入一些力量，搞一部匯集元代所有漢文文章的《全文文》，對元史學科的發展將是功德無量的事情。」北京師範大學古籍所於一九八八年十月，開始編纂《國內所藏元人文集版本目錄》，對國內元人文集的收藏情況，進行了普查。一九九〇年十月，在完成該項目初稿的基礎上，提出《全文文》編纂的設想，同年十二月，經全國高等學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項目評審組討論投票通過，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正式批准將《全文文》列為重點資助項目。一九九二年五月，《全文文》又列入《中國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規劃》重點項目。一九九一年一月至十月，《全文文》編纂工作小組成立，先後擬定了《全文文·凡例》（草稿）及《全文文》編纂工作計劃、《全文文》普查輯錄工作細則（草案）。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全文文》編纂工作全面展開，進入普查階段。普查工作分兩步進行：第一步查有關史部書籍；第二步查有關經部、子部的元人著述、元人刻書，以及總集、類書、釋道二藏等。一九九三年十二月，普查工作告一段落，共查閱書籍六五一〇種，一三一五一〇卷。初步統計，有傳記資料一二三四三四條，集外文三六〇九〇篇（其中相當數量的文章與文集已收文章重複）。根據普查結果估計：《全文文》所收作者約多於三〇〇〇人，文章約多於三〇〇〇〇篇，總字數約在三〇〇〇萬字左右。

一九九三年六月，在普查工作已取得一定資料數據的基礎上，我們又擬定《全文文》校點編纂

體例細則（草案），并由我所和江蘇古籍出版社聯合邀請國內元代文史研究的專家學者參加《全元文》編纂工作座談會。與會專家學者不僅肯定《全元文》編纂的價值、意義，而且對編纂這樣一部大型斷代文章總集的艱巨性和如何保證質量做了中肯的發言，還認真地討論了《全元文·凡例》（草稿）及《全元文》校點編纂體例細則（草案）。不少專家學者對元人小傳的撰寫、底本的選擇、校勘要求、標點符號使用，都結合自己的經驗，提出很多應注意的問題。座談會後，根據修訂的《全元文·凡例》（初稿）確定：《全元文》匯集元人文集及普查所得集外文，包括除詩、詞、曲、謠諺、小說以外的一切散文、駢文、辭賦等。按照「以文從人」的原則，凡已收入的作家，其文無論是否寫于元代，均一體收錄。經、史、子部著作，別集中的專著，一般不予收錄。《全元文》收錄作者的原則，上承金和南宋，原金朝管轄區作者以金哀宗天興三年（一二三四）為上限；原南宋管轄區作者以南宋末帝祥興二年（一二七九）為上限；以元順帝至正二十八年（一三六八）為下限。金元之交的作者，一一九〇年及以後出生者，一般入元。宋元之交的作者，一二四〇年及以後出生者，或一三〇〇年仍在世者，一般入元。以往以政治態度為列入何朝的原則，也不都合適。從道理上講，宋、金兩朝的人凡是入元，死于元朝者均可列為元人，如牟巖，前人習慣列為宋人，實為元人，有趙子昂寫的墓誌可證。在元朝這樣的人很多。以上收錄作者原則是與《全宋文》主編曾棗莊、劉琳先生商定的，主要是為了減少與《全宋文》、《全金文獻》的重複。

《全元文》編纂工作座談會後，校點編纂工作便正式開始。在完成前十冊書稿後，我們進行了一

次工作總結，將此前關於校點工作的文件匯集修訂成一個文件，即《校點工作細則》；同時對審稿和編纂工作進一步提出了要求。此外，還專門開了資料工作會議，一方面抓資料複製、歸檔工作；一方面根據發現的問題，補充進行普查工作。今後，如各項工作進展正常，一九九八年可以完成編纂校點工作。這里，我還想說一個不言自明的問題：《全元文》的「全」字，說明了本書的規模要求，但在實際編纂中，是很難做到「全」的。如已出版的《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唐文》、《全唐詩》、《全遼文》、《全元散曲》等都不全。《全唐詩》編得不錯，排印本一出版，立刻有補遺，而且數量不少；《四庫全書》名曰「全」，實際是不全。全，為何還有存目？何況存目之外，還有未列入者。元代研究基礎較唐代弱得多。重編《全唐詩》有不少前人成果可以利用，《全元文》就沒有這個條件，因此困難程度也更大。《全元文》將出現的問題會很多，這已是一些關心此書的學者意料中事。我們從未忘記這一點。我們要做的祇是在我們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盡可能減少錯漏問題。我們計劃在全書編纂校點工作完成後，與編製本書各類索引的同時，再編一部《全元文補正》，附於全書之後。

古籍整理運用微機，近年來已不是理論問題，不僅得到廣泛的運用，而且成爲一個重要的發展趨勢。從一九九五年初開始，我所計算機室配合《全元文》的工作，開始建立了元文普查數據庫查詢系統、全元文篇目作者數據庫、元人傳記資料數據庫等。今後還計劃建立更多的元代文史資料庫，以期逐步發展成爲一套完整的元代文獻資料檢索系統。雖然《全元文》未採用微機排版，但從長遠來看，還是應將全文輸入微機。這樣不僅便於編製各種索引（如人名索引、地名索引、逐字索引等），

進行微機全文檢索，而且可用于出版電子版《全元文》，以及修訂再版。我們希望這一設想能成爲現實。

編纂《全元文》是一項元代文史研究的基礎工程。我們力求通過《全元文》的工作，培養一些元代文化研究人才，加強本所的建設。北京師範大學古籍所已與國內元代文史研究者及有關單位建立了廣泛的學術交流，並發起主辦了三次元代文化、元代文學學術討論會。全所已完成的元代文史研究論著有《國內所藏元人文集版本目錄》、《元史全譯》、《元史選譯》、《元曲大辭典》、《元雜劇史》、《元散曲選譯》、《盧疏齋集輯存》、《喬吉集》、《薩都刺詩詞選譯》等，並出版《元代文史論考》專刊（《北京師範大學學報》增刊）四期。全所大多數研究人員都有元代文化專題研究計劃，正在進行專題資料的編輯和有關的研究，並準備結合主體項目的進行，將副產品和研究計劃組成幾個系列，如《元代文史資料叢刊》、《元代文化研究叢書》等，進一步將整理與研究結合起來，逐步開展對元代文化的研究。

文化研究有久遠的歷史，但又是近年來國內興起的熱門話題。研究目前多集中在一些總體問題，斷代研究則頗爲寂寥。元代文化研究，在某種程度上說，尚是一個被人忽視的課題，而且存有明顯的偏見。總體評價方面就存在歧異，或認爲元代步南宋後塵，進一步推行理學，阻礙乃至窒息了中國文化的發展；或認爲蒙古入主中原以前尚無文字，文化極其落後，入主中原以後，又實行民族壓迫，壓抑了漢文化的進一步發展；或認爲元代歷史短，皇室之爭很激烈，各種矛盾此長彼消，經濟發

展始終未出現高峰，文化也不能有很高發展；但也有人認為元代的文學、史學、哲學、藝術、科技都很發達，文化成就居世界領先地位；還有人認為元代是中國封建文化發展史上的第三次高潮。衆說紛紜，莫衷一是，現在迫切需要在深入具體研究的基礎上，除去某些偏見，科學地評價元代文化成就。早在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北京大學國學季刊》上發表的陳垣先生《元西域人華化考》的前四卷，一九二七年《燕京學報》發表後四卷，其《結論·總論元文化》中就曾論及元文化的總體評價問題：「蓋自遼金宋偏安後，南北隔絕者三百年，至元而門戶洞開，西北拓地數萬里，色目人雜居漢地無禁，所有中國之聲明文物，一旦盡發無遺。」又說：「故儒學、文學，均盛極一時。而論世者輕之，則以元享國不及百年，明人蔽於戰勝餘威，輒視如無物，加以種族之見，橫亘胸中，有時雜以嘲戲。」今天，我們仍應循着王國維、陳垣先生開闢的路徑，追步韓儒林、翁獨健、邵循正、姚從吾、楊志玖等老一代研究家，將元代文化研究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

元代文化是中國文化史上一個不可踰越的階段。任何一代文化都有其承前啓後的作用，都是中國文化發展中的一個鏈條，不能超越。但以往對元代文化的研究，偏見比較深重，如研究理學、詩文的著作，大都跳過元代不論，其它一些史著略掉元代的也不鮮見。出現這種狀況是很不正常的，而況元代並不是一個無足輕重的時期。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中華讀書報》載金克木先生《元代的輝煌》一文說：「秦、隋、元作為王朝都祇有幾十年，所開創的制度卻是漢、唐、明、清的淵源和範本。大帝國是短命王朝的繼承人。秦、隋、元好比書的引言、概論。」金克木先生還指出，他所說的

元代，「指的是從十三世紀到十四世紀的中國，以元爲名。從金國末期到元亡，南宋後期包括在內」。同時，他提出一個重要的問題：元代恰好是西方文藝復興的前夕，「元代作爲中國近代文化的開創時代行不行」？這樣來看元代在歷史鏈條中的位置，就與一般說的承前啓後的作用不同了。我是很同意這一說法的，一九九四年第二期《信陽師範學院學報》發表的拙著《近古文學概觀》也曾接觸這個問題。文章說：「考察中國古代封建社會中近代化開始的過程，考察這種文化上的轉變，考察文學方面優秀的俗文學作品的涌現以及傳統的詩詞文反映的新時期面貌的變化，才能尋出形成新的文壇面貌的時間。我認爲，可以把文學史上近古時期的起點定在南宋光宗紹熙元年，也即金章宗明昌元年。這一年是公元一一九〇年。這時期經過長期的發展而臻于成熟的新的文學形式——說話、諸宮調、戲曲——成爲文壇的新盟主。對這種文學現象應給以足夠的重視。」持這一說法的還不是少數，如岑麒祥先生所著《語言學史概要》也是以元明清爲近古時期；北京大學的中古史研究中心，就是研究漢以下、元以上歷史的。因之，研究元代文化史便有着重要的意義。這也是金克木先生盼望出現一部《元代文化史》的原因吧。

元代是一個多民族相互融合，又與外界有着廣泛交流的時代，文化具有多民族性和世界性這兩個特點。元太祖成吉思汗及其後繼人不僅征服中原，而且征服中國以外的世界。他們統治範圍到達中亞、西亞、東歐及俄羅斯，建立了欽察汗、伊利汗、察合臺汗等汗國，並征服過東亞、南亞諸國。蒙古的興起、元朝的建立，確實是影響世界歷史的一件大事。元朝也是中國民族形成的重要時期。成

吉思汗統一諸部後，具有不同特徵的各部草原牧民，逐漸形成共同以蒙古爲名，并一致使用蒙古語的蒙古民族。從中亞、西亞來到我國內地的許多民族，由于共同信奉伊斯蘭教，逐漸形成回族。維族（畏吾兒）等西北民族是蒙古統治的主要助力，不少上層人物居于政權的上層，并且具有很高的漢文化修養。一二四四年西藏薩班攜八思巴、恰那前赴涼州，一二四七年與闊端太子商妥了烏斯藏歸順蒙古的條件，并發回了有名的致烏斯藏納里的僧俗首領的信。西藏從此成爲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元朝在西藏設立了十三個萬戶府。藏族成爲中國民族大家庭的一員。元世祖忽必烈平大理國和設置雲南行省，奠定西南郡縣的版圖，對西南地區民族的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元朝對東北女真採取「設官牧民，隨俗而治」的辦法，鼓勵開荒屯田，加強和內地的聯繫，也促進了女真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當時回教世界通行的語言是波斯語，故元朝官方使用的文字是漢文、蒙古文、波斯文。所以，元代文化的多樣性是顯著的。元朝在中外經濟文化交流方面，開創了空前繁盛的局面，既輸出中國的文化，又吸收外來文化；在國內各族之間，有衝突也有融合，在融合中有抵制也有吸收，這種撞擊促進了中國文化的長足發展。

元代文學藝術、史學、哲學、宗教、科學技術，都取得重大成就，元代文化在當時世界上居于領先地位。元曲（包括雜劇與散曲）這一新的文學形式成爲一代文學的代表，出現了關漢卿、白仁甫、馬致遠、王實甫、鄭光祖、喬吉、張可久等雜劇、散曲大家；元代南戲與雜劇併行，元末明初，《琵琶記》與《荆釵記》、《白兔記》、《拜月記》、《殺狗記》等五大傳奇流行；小說方面，在說話盛行的基礎上，元末明

初《三國志通俗演義》、《水滸傳》面世。這都是中國文學史上的重大發展。胡適在《吾國歷史上的文學革命》中說：「文學革命，至元代而登峰造極。其時，詞也，曲也，劇本也，小說也，皆第一流之文學，而皆以俚語爲之。其時吾國真可謂有一種『活文學』出世。」元代詩學唐，文學漢、魏，開復古風氣，主張道統與文統的統一，實是明代前後七子、唐宋派、清代桐城派的先導。元代張炎的詞，對明、清，特別是清詞有着重要的影響。戲曲藝術也是這一時期進入成熟期的，元代戲臺觀看角度從四周向前方三面的轉移已經完成，這便是重要的標志。北曲雜劇以唱爲主，唱法是一種宣叙的風格，節拍可以隨意伸縮，很適宜獨唱；南曲的崑腔，元末在新興起的碼頭所在地崑山出現，這在歌唱史上也是大事。元代舞蹈不僅承宋制，隊舞很流行，而且民族舞蹈非常盛行，《十六天魔舞》、《八展舞》等宴樂舞，以及宗教舞、民間舞都具有多民族特色。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中保存元代壁畫的舞蹈畫面，都反映了元代舞蹈的面貌。元代的書法成就是大家公認的，趙孟頫、鮮于樞、迺賢、康里巎巎、鄭杓、陳繹曾、倪瓚、吳鎮、陸績善、張羽、楊維禎、俞和等書家林立。繪畫方面，文人畫的確立，在中國繪畫史上有着劃時代的意義。趙孟頫、高克恭和元四家黃公望、吳鎮、倪瓚、王蒙，均是一代名家，且詩、書、畫并列成爲完美藝術形式。元代的建築成就值得稱道，如金克木先生所說：「蒙古人善于屠城，這時居然建城，而且是建一個各民族聚居的，可說是當時世界上罕見的大都市。」整個大都城（今北京），就是一個完整的藝術品。永樂宮建築羣，也是一個完整的藝術品。山西洪洞縣的廣勝寺、稷山縣的青龍寺、五臺山的廣濟寺等都是有名的寺院建築。元代修建的喇嘛塔與一般的佛塔不同，如尼

泊爾建築師阿尼哥修建的大都大聖壽萬安寺（明改名妙應寺）白塔，便獨具特色。元代修遼、金、宋三史，正確對待三朝關係，使三朝史料基本得以保存，其功績是不可忽略的。此外，胡三省的《資治通鑑注》、馬端臨的《文獻通考》，也是史學史上的名著。元代朱思本經過實地考察，參閱前人圖籍，完成《輿地圖》，這個全國地圖精確程度超過前人，是中國製圖史上的傑出創造。《大元一統志》的編纂，在學術史上也有很大價值。特別應該提到的是元代探求黃河之源的壯舉。至元十七年（一二八〇），元世祖忽必烈下詔說：「黃河之入中國，夏后氏導之，知自積石矣，漢唐所不能盡其源，今爲吾地。朕欲極其源所出，營一城，渾番賈互市，規置航傳。」派都實爲招討使，探求黃河之源。經過四個月時間，都實走了四五百里，探得火敦腦兒（即星宿海）爲河源。理學在十二世紀末，由于朱熹、陸九淵的出現而進入新的發展階段。但理學在南宋還是私學，元代則上昇爲官學。元代所出經學著作比兩宋還多，這些著作對明代影響很大。著名理學家有許衡、劉因、金履祥、吳澄等。元代所出經學（包括喇嘛教、禪宗、白雲宗等）、道教（包括全真教、真大道教、太一教、正一教等）、薩滿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天主教等均得到發展。元代學校教育「遠被遐荒」，據至元二十四年（一二八七）的統計，全國學校有二〇一六六所，出現前所未有的局面。元代在中央設置國子學、蒙古國子學、回回國子學；地方教育創建一種普及教育的形式——社學，並建立醫學、陰陽學，前者培養醫學人材，後者培養天文、地理、算曆等自然科學人材。民族教育得到發展，特別是蒙古族教育已有完整的體系。私學和書院均十分發達。元代新建書院一四三所，復興書院六五所，改建書院十九所，共計有書院二二七